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一期

(总第六十二期)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二月四日

喻家坡解放见闻

黄家提

10月5日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一期

(总第六十二期)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二月四日

喻家坡解放见闻

黄家捷

10月582

喻家坡解放见闻

黄家捷

我是喻家坡人，当年解放时的情况，深印脑海，今年暑假重返故里，那些难忘的记忆，遂又浮泛起来，促使我写下这篇短文。本来《永川文史》第一辑和五辑早刊印过黄鸣皋、刘邦孝等同志关于解放喻家坡的资料，已勿庸赘笔，不过，当时各自站的角度不同，他们所见的不一定都是我见到的，因此，不忌读者谓我罗嗦，仍对此事作些补充。

1949年12月4日永川和平解放，听说城内群众载歌载舞地欢庆庆祝，可我们寨子内的人大都阴沉着脸，隐藏着无限恐惧，只少数充当绅粮老爷役使的人背地里窃窃私语，似乎在交换什么开心的消息和心事。我和二哥已从小学里回家欢度寒假，盼望过年。日子很快流去，寨子内的气氛却天天紧张起来。国民党永川县党部、三青团骨干兼特务苏温宗、本寨保长黄海波、护寨队队长刘万才及其弟刘万杰等与恶霸匪徒陆续开进寨来，共约380余人。他们把原制就半尺厚的铁甲门关上了，并在里面用两三立米条石堆砌抵挡。进出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后在城墙上吊上、放下。他们的反革命宣传深入到每家每户，尤其是妇女儿童感到恐惧。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要共产共妻，要把小娃儿煮来吃，以壮胆量。我和二哥在小学生中胆子是较大的，也半信半疑。然而顽皮、好奇的天性并未被恐吓气氛压服，即便是后来寨内寨外互相射击时，我们也曾利用间歇之机跑出房外偷看。

一天，二哥带我到寨门口玩，看见几个匪兵枪尖上倒挂着鸡或颈挂着鱼，另一个却担着大挑菜；后面跟着一个老农作揖拱手地哀求：“先生，鸡你拿去，多少给点米吧（当时的通货为银元、棉纱、大米）！”一个匪班长似的小头目狞笑地拔出手枪说：“米，老子给你一颀‘花生米’！”“他妈的！老子打仗辛苦，只不过吃点鸡，要是共产党来了，还要共你的产、共你的妻！呸！”吓得老农浑身发抖，只好悻悻而去。小头目回头见我呆望出神，便又吼道：“你这小丫头看啥子？不是我们来保护你们，你早被八路煮来吃了！那煮娃儿的锅，装得下‘你’四个！”我们只好不看他们了。

1950年3月29日下午，城墙上传来消息，八路军来了，没有带枪。群众纷纷拥上城头观看，我和二哥当然也挤在里面。只见六个衣冠整洁，仪态端庄的军人在城外

一字排着，为首者手擎红旗，依次者手举话筒，对着城上几十条枪口喊话：“老乡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穷人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人民。你们不要受坏人欺骗，轻信谣言，快开城门吧！”

国民党的官兵们：“你们虽然干过一些危害人民的事情，但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只要你们开门投降，将保障你们生命安全……”。

解放军反复向寨上喊话中，一个尖嘴猴腮的匪徒正想将黑枪，后面一黑汉向他猛踢一脚骂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龟儿有那种胆量和气魄吗？混帐！”

天快晚了，解放军喊话的同志最后喊道：“……你们不要执迷不悟，走自绝于人民的死路。看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能赶走盘据大半个中国的日本鬼子，能打垮蒋介石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难道打不下你这弹丸之地的瞭家坡吗？限你们明日八时前投降，人民解放军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这些有力的话句，如利剑穿人们的心胸，被威胁的匪徒有些动摇，寨内良民面面相觑。一个较开明的绅士向匪头建议说：“正规军尚不堪一击，不如顺天由命；闭门抗拒，定是玉石俱焚！”他的话得到群众支持，有的竟自告奋勇去搬抵门条石。匪头刘万杰把枪一拍，“谁搬石头，我就打死谁！”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暗自咒骂黄、刘二匪头不该引狼入室，害得寨民骑虎难下，等待遭殃。

次日(30)日8时前几分钟，解放军喊话的同志再度喊道：“……你们现在开门投降，为时未晚！”寨内毫无反应，解放军准时进攻了。战火激烈情况，黄、刘二文已有叙述，且本人时在寨内，寨外何如进攻，并未亲睹，姑且从略。但枪炮声较密集的地方为南门城城外未挖好护城河的一段，那里地势开阔，成为解放军进攻的突破口。经过定点射击，城墙出现了缺口。土匪紧张了，知道解放军将从那里攻入，便强逼寨内穷人用肉体前往堵塞。解放军见系一批徒手穷人，呼天叫地拦阻缺口，只好停止射击，把目标转向缺口附近的炮楼。在黄昏时分，炮楼被轰垮半截，只剩下六米高的石牌部分。晚上，双方停止了射击，堵塞缺口的穷苦群众见解放军利用夜色掩护，救走了几个伤员，他们互递眼色，未向土匪报告。

土匪们轮番去吃肉喝酒，过足了鸦片瘾，又赶来一批寨民加强守城防范。并从各家

中强交破锅铁、铁钉，砸城碎屑，补充土炮所用。战斗中，寨内群众从城垛、屋檐危险三番几次哀求匪头刘、黄等人打开寨门迎接解放军，都遭拒绝。他们在激战之中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一些寨内头面人物在匪头刘万才的叔公带领下要求打开寨门。刘万才出手枪恶狠狠地说：“再罗嗦，我以叔公‘刘三’，可认不认你叔公！”气得老人顿足大骂：“孽子，畜牲！你死在屋檐，还要吓唬寨民，看三叔咋去见祖宗？”刘匪恼羞成怒，正在举枪欲射中，李汝芳人阻住，没有造成忤逆杀亲恶果。

又次（21）日晨，解放军发起攻击了。炮声稀而枪声密，骤雨般的突然停止，匪徒高兴欢呼：“八路军的炮不生儿了（意谓无炮弹）！他们快溜了，万岁！在远处！”正狂呼得意时，忽闻土匪闻风丧胆的歪明连长（土匪给伍志江连长起的绰号）忽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一梭接歪明连长的子弹向匪徒倾泻。后面继续进来解放军，兵分三路直冲寨内搜剿。其中一路直奔中军（寨内地名，土匪指挥部），击毙了苏温宗，俘获了黄海波、刘万才，打伤了刘万杰。其余匪徒群龙无首，纷纷窜向寨西北面跳墙逃命。他们奔逃时不知是生成的匪性或是防范阻截，边跑边放枪，误伤了许多无辜群众。同时一路狂吼：“八路匪徒进寨了，杀人放火，鸡犬不留！快快逃命呀！”由于寨上妇女长期未出家门，未受教育，在国民党恶毒的反革命宣传下，对“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深感恐惧，纷纷跳水自溺。在董家堰塘（寨内三口堰塘之一）就有二三十人跳在水中，尚有一些正往塘边跑来。如：

方家女人逼着自己的女儿已跳在水中，还向刚跑到塘边的董相丞喊道：“五妹，活下成了，快跳下来吧！”“不，我先问问妈妈。”她妈正搂着三个女儿哭着说：“走！要死就死在一起吧！”解放军搜寻土匪来到塘边，一见此状，立即制止，并叫塘里的女人上岸来。那些妇女平时未下过水，兼之半截身子陷在水下浮泥里面，那里拔得起脚。十几名解放军便又下塘把她们拯救起来。其中有个妇女叫晏振华的身体很胖，中反宣传得很深，她见两个男娃子陷在塘中，两个解放军花很大力气才把她拖上岸来。刚一上岸，她竟发狂似地把孩子抛入水中，解放军再一次下水抢救，可孩子已被水呛肺，没有救活。这次跳水自杀的妇女，外面谣传很多很多，其实，只有方家母女少数人。因为他们先是入水中，解放车尚未到达塘边时，已奔往深处沉顶了。后来那些被救妇女，无不由衷

地感谢解放军，责备自己听信谣言，险些成了枉死鬼。

土匪在西北面跳墙逃跑时，一些支持过土匪的绅粮，或被胁迫守城墙的贫民，或受深度惊惧的寨民也跟随土匪跳墙。他们一涌而上，尚未作好跳的姿势，就被后面的人流挤下四丈多高的岩下去了。先跳下的人有摔伤的，后跳的人有先跳的人作垫，受伤的却很少。但所跳下的人除少部分匪徒逃脱外，一般都身陷在护城河齐胸深的泥水中。及至解放军赶到时，才制止住这种惊乱行为。有几个人不听话，利用茂密的葫芦作掩护，爬上岸逃走，解放军向空放了一枪，那些人才停住脚步。陷在泥水里的人冷得瑟瑟发抖，解放军见系普通寨民，叫他们各自起来回家换上衣服听候集中审问。唯有一个小孩站在水里呆若木鸡，动也不动。一个解放军马上下水把他救了起来。这个孩子名叫罗学桂，12岁，住在寨北城墙上，家中经常断炊。这次是被人流挤下护城河的。由于饥饿、寒冷、恐惧，以至动弹不得。解放军给他洗去了身上污泥，披上军衣，帮他洗衣裤，带他到炊事班烤衣服，让他啃馒头，烤火。一会，这个战士有事去了，罗学桂呆望着炊事班的锣锅出神，转头又看见炊事员拿起特制的大切面刀（准备给孩子切面条吃，暖身子）猛然一惊，急忙脱下军衣，光着身体一溜而去。原来他没有见过军队中锣锅，误解为是煮娃儿的，也没见过那样大的刀，误解为是宰娃儿的。万恶的反宣传，当时不知害过多少无知而善良的人啊。罗学桂现在是重庆机械厂的退休干部，还经常向人淡叙这件往事，从内心深处表达他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救命之恩。

土匪被打垮了，跳下寨墙的那部分，只极少数能幸逃脱，其余的都抓了回来集中审查。为了搜索隐藏匪徒，解放军挨家挨户清查。当时，好多户里都没有人，一则怕房屋震塌压伤，二则户外好寻有利地形隐蔽。他们搜向冉家时，发现屋里无人，一个一岁多的冉天福在屋角的破烂堆中直哭。解放军把他抱了出来，看见包孩的棉絮浸透了血，仔细一看，身上四处受伤，知系土匪逃跑时乱枪射中的，赶快送往护士组进行抢救。由于伤处在肩、臀、腿部位，取出子弹、敷好伤药后孩子就不哭了。冉天福的妈回家只见血污棉絮，不见了小孩，正怀疑孩子被宰煮汤时，解放军亲自把伤孩交给她，叫她明天到卫生室换药。这个愚蠢而善良的母亲，如梦初醒，噙着眼泪连声称：“解放军呀，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我家在寨北靠城墙处，害怕轰城墙的炮弹误伤，父亲便把全家带到黄仕俊家暂避。他家房屋四层，底室较安全。解放军来搜索土匪时，盘问每个成年人，我父亲说明暂避缘由，并经黄家厨工、奶妈等七八个成人证明属实后，便叫父亲不要乱走，免遭误伤。

是日下午六时左右，寨内戒严解除。那些被带去集中审问的，只要是原先住寨，而且不曾扛枪打过解放军的群众，都被放了回家。他们边走边想，家中无人，恐怕东西都被抢光了。及到家一看样样都在。其中一家还多了一具匪尸。尸首旁散落十多枚银元和几件值价的衣物。银和物都是这家箱柜中所存放的，查检数目不多不少。很显然，这具匪尸因搂抢民财，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

喻家坡被解放后，永川地区还闹了几个月土匪。他们捏造事实，说解放军攻进寨时，愤怒之极，端枪横扫，致使许多寨民误伤；逼使许多妇女跳水自杀；许多人家的财物被一抢而空等。其后三四十年中，常有一些猎奇者向我这个道地喻家坡人问及真象，我坦波地回答：据我亲眼见到的，误伤者仅刘邦孝的母亲（刘文已述及）和小孩冉天福，而且解放军还亲自给他们医治。妇女跳水者有之，纯系轻信“共妻”谣言所致，溺死者亦系少数。若非解放军及时制止、抢救，恐怕不系少数了。至于一抢而空，纯系匪徒贯技，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诬蔑解放军罢了。我家及许多寨民家无人看守，就未丢失一针一线。解放军离寨后，寨民集体为死亡者做“道场”，超度亡魂，计设有206个灵牌。其中有土匪、被胁迫者，轻信谣言的自溺者。这些灵牌是我亲自敬过的，也未有公开报导过。

寨上乌云既扫，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已成浓烈的气氛，有20多名男女青年光荣参军，他们是董贤伦、董良益、黄仕俊……等。

解放此寨，计牺牲战士17人。他们大都经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等大小战斗一百多次，为共和国的建立曾立下战功，想不到在此地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喻家坡城墙南面的一片黄土，埋葬着忠骨；其后建立了烈士陵园，供后人永远凭吊。我在陵园里敬谒了每块墓碑，对烈士们英雄形象、牺牲精神非常敬仰，乃吊以辞曰：

救民经血战，浩气干云天。

黄土埋忠骨，丹心照史篇。

素花益肃穆，碧树护陵园。

岁月如流水，国殇万代传。

永川文史资料

第二期

(总第六十三期)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日

永川村乡行政区划名称的演变

邓崇仕

永川市蚕桑生产的发展

黄家捷 万俊宁

109/118

永川村乡行政区划名称的演变

邓崇仕

宋代宗大历11年，“割泸州、璧山界别为一邑”建置永川县，隶昌州。境内山脉纵横，林木茂密，人烟稀少，地方基层政权设置，尚无资料可考。《元丰九域志》载，宋代，永川有11镇，即牛尾镇（今太平）、永兴镇、来苏镇、猴溪镇、罗市镇、欢乐镇、铁山（今茶店）、永昌镇、永祥镇、咸昌镇和龙归镇。元代，为防范人民造反，在乡里建立村寨制，每五十家编为1社，社长为汉人，另派蒙古人监视。据传还十家共一把菜刀，其统治手段，可谓毒矣！明代成化，永川有2乡25里，2乡即来苏乐善乡（今石脚迹），25里即新屯里（苍宝山）青峰里（今青峰）、同心里、在廓里、梁洞里、东皋里、桂花山、白石里、砂山里、太平里、松子里、石松里、来苏里、龙洞里、英山里、高仙里、双石里安平里、星辰里、独石里、迭德里、安贤里。清顺治十一年，将永川编为三乡一里，三乡即来苏乡（今陈食、临江等地），乐善乡（今来苏、王坪等地）和太平乡（今双石、太平等地）；一里即安贤里（今青峰新店等地）。每乡、里各分三甲，设里耆、乡约、保正、小甲、总甲、客长、牌头等负责人。后又分为六乡一里，即新老来苏、新老乐善和新老太平，这是按移民到达先后分的，后来的冠上“新”字，实际都杂居一处。乡和里都是基层政权组织，相当于今之区。而人民生活、生产必需的物资，还是有赖于一定的场所进行交易，日后这种场所逐渐成为基层政权中心的场镇，场设场董或场正。清乾隆时为22个，道光时为25个，光绪时为35个，雍正时明确规定十家为一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一保，保有保长，其职责是“联保甲以缉贼”和办理钱粮差役，保甲制始具雏型。咸丰年间，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团练）打败了太平军；从此，各州县仿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办团之风，延续到民国十几年。民国初，全县已形成41个场，场设团正；每个场都有几个团，团有团首；团以下为甲牌（排）编制，名义上它是军事性组织，实际掌握着地方一切权力。民国七八年间，取消了团，另设大保，如当时青峰有4个大保；保有保正，乡为大保正；以下仍为甲牌（排），其职责只办理钱粮夫役等事。在社会治安上，则由每户出壮丁1人，组成门户练，归场的治安大队长统一调动指挥。同时，场上养有兵丁，人数各场不等。民国22年改场为乡，乡政机关全称为“××乡公所”设乡长。民国24年国民政府实力到达永川，整编保甲，改乡公所为联保办事处，全县共49个联保，乡长改称联保主任；改甲为保，改牌为甲。民国29年，实行“新县制”，改联保办事处为乡（镇）公所，主任改称乡（镇）长，年底全县为2

8个乡级，设乡公所。1949年永川解放，全县为43个乡（镇）“××乡（镇）公所”，名义未变。人民政府建立乡政权，改乡公所为乡人民政府，改保为村（按数字编号），改邻为邻；村设正副村长，邻设邻长。1955年9月，乡（镇）人民政府改为乡（镇）人民委员会，乡（镇）长、村长，开始民选。1958年10月，全县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改乡（镇）人民政府为乡（镇）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置社长1人，副社长1—4人；改村为生产大队（一段时间为管理区），邻为生产（小）队，大队设正副主任，生产（小）队有正副队长。在口号“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下，搞农业生产。1968年10月全县各乡（镇）人民公社先后建立公社革命委员会，置主任1人、副主任1—4人；村一级组织未变。1983年9月，撤销公社革委会，恢复原有乡镇人民政府建制，仍设正副乡（镇）长；改大队为村（以地命名），设村长；改生产（小）队为居民小组（合作社），设组（社）长。乡、村、组称谓，直至今日。

永川市蚕桑生产的发展

黄家捷 万俊中

我市气候温和，地属浅丘地带，土背坎多呈梯形斜坡，四周的光热适宜栽桑，个别地方有很多荒坡，也可栽桑。发展蚕桑生产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养蚕和养猪相比，前者更有见效快，投资少，收益大的优点。而且蚕沙的肥效有利于使用化肥过多的土壤改良。对促进农业增产也有一定作用，所以不少农民乐于养蚕。

解放前蚕桑发展的艰难走步

永川养蚕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先只是民间少数喂养，自己缫丝作丝线染色，卖与官家绅粮小姐、太太或民间艺人作刺绣用。鸦片战争后，清廷不断割地赔款，农村经济急速破产，鸦片的毒害延伸到神州各地，永川的农村也到处种起罂粟来，这使一些爱国志士忧虑不已。清光绪二十二年（1906年），县人曾瀛藻奉命在永川南门新桥附近开办“蚕桑传习所”，栽桑2000株，招收20名学生，学习养蚕缫丝。清宣统元年（1909）年，留日归国学生晏粹琴、袁国藩、李益均等怀着振兴家乡，造福民众的爱国热情，欲以教育推广蚕桑，以蚕桑取代种罂粟的美好愿望，集资在南门桐子坳建立一所蚕桑学校，收了一百多名学生。他们不仅传授养蚕知识，还在全县各地自办桑园，亲自栽桑养蚕作示范，意在鼓励农民仿效。可惜由于桐子近亲交配，技

技术差，蚕病暴发而无计可施，奋斗三年便失败了。学校也因革命党人多系留日学生，朝廷颇为快视而被迫停办。留学生们创办的事业虽未成功，以后桑园也不存在了，但已习惯作为地名“桑林坡”、“桑园”沿用至今；所栽之桑有活九十年之久而未枯槁者。这些遗迹对于那些爱国留日学生却能引起景仰和怀念。民国四年（1915年）国民政府严禁抽鸦片，禁种罂粟。遵照“扶助工农”的政策，永川成立了蚕务局，设置局长、技师、技干、局员各一人，拨公地20亩为苗圃，招收25名实习生学习经营桑园苗圃，换种湖桑良种，并从猪税中提款资金，以助蚕桑发展。苗圃师生育苗、栽桑、改进制种，引进湖桑、传授技术、奖励养蚕。张贴告示“栽桑百株者年奖蚕种两张”。他们在民间征集自制土种的基础上，养蚁蚕三两，改良蚕种育种600张。除自用外，其余奖与大安、陈食、太平、仙龙等地16个乡场的农户。当年收回的茧子，小而层薄，形状是束腰形、或笔尖形，产量也低，而且一年只养一季。解放前永川产茧量最高是1923年，计394斤，其余年度都只有125斤到234斤之间，当然尚有少数自留缫丝的，未计在内。

到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压低蚕茧价，致使农民弃蚕种粮。据史料记载：“桑树砍伐殆尽，蚕种几乎绝迹”。爱国志士提倡和经营三十年的蚕桑事业，三起三落，以至一蹶不起。

然而永川首批养蚕户中仍有一枝独秀者，竟将养蚕业一直坚持到解放，如大安场桂花屋基的万席珍，为发展蚕桑，竟将自家仅有的40担田去换两个干坡来栽桑养蚕、缫丝换粮。他每年只喂春蚕一季。由于他对蚕桑管理细致，蚕房前后用石灰水消毒，并用以煮烫蚕具，蚕期用大蒜汁添食，防止了蚕病发生。他自己会缫丝、作丝絮，所以他每年养蚕收入便是那40挑田收入的两倍多。养蚕后，他将枝条剪去，便不影响农作物所需的光照，加上蚕沙施肥，两坡庄稼长得人人赞美。他常对人讲“一张桑叶一碗饭，栽桑养蚕真划算”。他就靠那两个桑林坡养蚕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而且日子过得比别人轻松自在。他当年爱如珍宝的湖桑，如今还有十几根保存在桂花屋基旁，而且年年枝繁叶茂。

解放后蚕桑发展的突飞猛进

建国后，永川百废待兴。党中央号召大力发展蚕桑生产，各级领导认真贯彻落实政策。国家每年拨大量专款到永川，无偿地扶持农民养蚕致富；各区安排专职干部抓蚕桑生产；定点派人集中培训，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科学养蚕技术、育苗管理和各种芽接技术；

引进外地各种良种，改进草桑、老桑，以保蚕食足用；建立朱沱、来苏两个蚕种场，保证蚕种的供应和质量；各区乡备有大量蚕药，保证蚕前、蚕期、蚕后的严密消毒；各区设置收购站，保证农民卖茧方便。这一系列有效措施，调动了全市农民养蚕积极性，使永川市蚕业发展跃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后的永川是在1954年开始育苗栽桑的。1956年养蚕（种）7张，种子是外地良种，产茧4担，茧子洁白，呈椭圆形或浅束腰形，茧大而层厚，无论数量、质量都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从1958年开始在全县推广双季蚕，大大提高了年产量。到1960年，全市栽桑370万株，产茧516担，为解放前最高年产的129倍，这是永川蚕业的第一个飞跃。

由于三年大旱影响，永川蚕茧年产量徘徊在200—400担之间。此后年产量逐渐上升，到1965年，为了充分利用气候特点和桑叶，全县推广养四季蚕，当年收效不大。但到1976年，温和的气候给四季蚕带来了丰收。蚕茧年产量934担，为解放前最高年产的237倍，是永川蚕业的第二个飞跃。

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中，全国各行各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永川市蚕业却未遭到“文化大革命烈火”的燃烧。干群同心，平均年产量以502担的产量递增。到1977年，年产量突破“万担大关”产茧10796担，是永川市蚕业的第三个飞跃。

第四个飞跃只用了两年时间。1980年产量为20366担，胜利地突破了“两万担大关”。

第五个飞跃也只用了两年时间。1982年产量为31452担。以每年5032担递增速度，跨过了“三万担”雄关。

此后三年，由于土地下放，部分不熟悉养蚕技术的农民便乱砍桑树，加之物价上涨，茧茧未提价，使蚕茧产量跌回到25000担左右。为提高农民养蚕积极性，国家采取了系列措施：拨专款20多万元为农民买进良种改造劣桑；举办技术培训班，让愿学的农民都来学；买来优良蚕种让他们自育自裁；组织专业队到各村社大搞芽接，热情地把科学养蚕技术印成册子，送到千家万户。经过两年努力，年产量又节节上升，到1992年，年产量已达到38200担，这是永川市蚕业的第六个飞跃。

永川蚕桑事业的发展，就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迈进。展望未来，一幅美妙的前景，正吸引着广大蚕农向它攀登。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三期

(总第六十四期)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

永川市茶叶生产的发展概况

黄家健 万俊宗 10.122

寺峰乡抗旱夺丰收记

邓崇仕 10.116

气象土专家——邵神仙

水绍韩 10.119

永川茶叶生产的发展概况

黄家婕 万俊宗

茶叶具有生津止渴、消食利尿、提精醒神、除湿清热、解油去腻的奇效，所以它和咖啡、可可合称为“世界三大饮料”。

永川市有五条山脉：巴岳山、箕山、阴山、黄瓜山、花果山(云雾山)。这些山脉上有19万多亩土地适宜种茶。因此，永川市发展茶叶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可是在解放前永川人民除少数茶农外，劳动人民衣食困难，无钱品味茶香，家中的人也只有用荆芥、薄荷来解渴待客。

据永川县志记载：巴岳山、箕山在民国初年便是产茶地区，年产茶680担左右。茶农只能生产白茶和苦丁茶。制茶工艺古老简单：每年二、三月间，采摘叶置笼内蒸之使其柔软，装入竹篾筐压成型取出晒干为素毛茶(白茶)。白茶质味俱佳，供应市场，但价格低，产销无人管。家茶和苦丁茶大多采来自用。临近解放时期，由于土匪猖獗，占山为巢，威迫茶农下山，使本不景气的茶园荒废，幸存的茶株成为零星野茶，至今犹在。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永川的茶叶生产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得到起死回生的拯救，并逐渐发展壮大。总的发展情况是国营茶场发展早，实力强；乡村茶园起步晚，潜力大；省茶叶研究所研制的良种和茶业科技的推广为永川茶叶生产腾飞插上双翼。其发展情况如下。

永川新胜茶场建立于1952年11月。该茶场分点在巴岳山，箕山开荒种茶12000多亩，采用先进的科学种茶技术，用等高梯形条列式种茶，使茶树能充分地利用光能和热能，为永川茶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步骤上先是淘汰旧种，引进新品种来提高茶叶的产质量。1953年，引进云南大叶茶试种成功，投产面积2700多亩，效果极佳。这在“南茶北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事实证明，云南大叶茶不仅高产，而且质优，是制红碎茶的优良品种。此后，逐年引进的良种还有广东乐昌白毛、龙井43号、福云茶系、湖南湘皮绿、湖北宜红早、安徽黄山种等国内良种和一个日本种。良种的引进，促进了永川茶业的发展，对振兴永川经济作出了贡献。

该场经过6年努力，到1958年产量由61担一跃到2913担，第二年又猛增到9663担。在省茶研究所，西南农学院，上海茶叶出口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们的指导下，他们开始试制分级红茶。1964年，该场试制红碎茶成功，为国内生产红碎茶提供了技术资料，并打开了国际市场。随着红碎茶的销路打开，为了解决精细加工，降低成本、节省原料等问题，通过专家们和职工共同努力，该场试制的818型转子机和静电拣梗机制造成功，它为提高我国红碎茶质量作出贡献，因而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奖。

四川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简称省茶研所)，于1962年迁来我市箕山。他们不仅给永川茶业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他们的实干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同时他们还还为永川培

养了一大批茶业专业技术人才。

永川茶的质量提高省茶研所作出了重大贡献。1964年红碎茶的研制成功使永川茶香飘四海，1979年又获碎茶三套样优质奖，1981年花香红碎茶试验成功，1983年又试制成功了乌龙茶，1985年健尔康茶露间市，同年永川“芽秀”连续三年在全省获地方产品优质奖，并在全国名茶会上受到表扬。专家们还培育了用川茶和云南茶杂交的“蜀永1号、2号、3号”分别在1984年至1985年相继被鉴定为良种。“蜀永”系种不仅高产，而且优质，是制造绿茶的优良品种。这些科研项目成功使永川茶身价陡涨，闯入国际市场，为振兴永川国民经济作出贡献。有的科研项目还获重大科学成果奖。

省茶研所设置了品种园、试验园、丰产园共716亩，进行科学研究和管理。他们管理的丰产园为我市茶叶生产高产树立了榜样，向人民展示了科学种茶的重要性。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永川茶叶的优势，搞好科学种茶，专家们还专门分期分批培训茶业技术骨干，从推广良种，稀形条栽，树冠更新，施肥治虫，采摘制茶，按不同季节，现场传授整套技术，及专业知识和自然变化中应注意的事项。使永川茶叶产量及产值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永川茶叶增产作了有力的保证。

乡村茶园兴起于1963年。那年朱德同志视察箕山，对永川茶叶大加称赞，号召向“荒山要茶”。于是永川便掀起了种茶热。首先是城关镇组织143名知识青年在阴山（箕山）兴办“青年茶场”（1973年移交双石乡茶果园）开荒种茶250亩，为乡镇茶园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1965年永川县外贸局帮助社队建立联办茶场。到1972年时，全县有联办茶站75个，队办茶场80多个；开荒种茶7732亩。又办了专业性大小茶场8个，炒青毛茶车间42个。产品遍及省内外，不仅为山区茶农开辟了广阔的致富门路，茶香还随改革春风飘进了万户千家。

由于茶的品种改良、科学管理，永川茶产量在1965年就突破了万担大关。又经三年努力到1969年便突破了两万担大关。截至1991年，全市有茶园13000多亩，年产24332担。

如今永川五条山脉已披上盛装，山顶是层层茶园如绿云接天，茶园下是果园，桃李竞艳、梨苹飘香。永川茶在茶市上供不应求，在省内外冠压群芳，在全国誉为一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永川茶是永川人的骄傲！

青峰乡抗旱夺丰收记

邓崇仕

1979年，青峰乡遭受多年未有的特大旱灾。这年入春以来直到端午节，都没降大雨，正冲田龟裂口有如拳窝，遍地竹树枯黄，人畜用水困难；社员戴了几次秧，都栽不下，心急如焚。乡政府在上级党和政府指导下，克服靠天吃饭的等待思想，及时率领社员展

有天社员们集中挖黄昏田时，他见拦路蚊扑脸，蚂蚁搬家，于是向大伙宣布第二天有雨，动员大伙加油多挖田，以免下雨后更费力气。可大伙将信将疑，七嘴八舌，有个一贯吊儿郎当的社员高声叫道：“我肯信你邵文轩变成了邵神仙！”第二天大清早，他见乌云遮东火烧天，心想昨天说的准会兑现！早饭后适逢大队和公社干部到各生产队检查工作，他就向大队支书胥明章报告说：“跑快点吧，不等中午有大雨！”果如其所言。从此“邵神仙”的外号就不胫而走。这就更加提高了他潜心研究气象的兴趣。

他研究气象的经验大略可分四类：（一）观云状变化：例如毛卷云（积丝状）主雷、风；絮状云主暴雨；薄云蔽光主小雨；南北积云主大雨；透光高层云主天晴。（二）看动物表现：例如拦路蚊扑脸主雨；涨水蛾出飞主晴；黑蚂蚁成堆主雨；白飞蛾双飞主雨；鸡晒翅主雨；蚂蚁土穴搬石穴主雨；乌梢蛇下坡主晴；米贵阳（杜鹃）连声叫主雨，回声叫主晴。（三）察自然现象：例如春雾雨，冬雾晴；厨房闷烟主雨，烟子过沟主晴；土路开坑，横开主雨，顺开主晴。（四）按季节规律：例如春犯甲子雨绵绵，冬犯甲子雪飞天，夏犯甲子禾生儿，秋犯甲子主冬干。四季甲子不宜雨，四季丙寅不宜晴。夏至赶端阳，有雨好几场。夏至下九高，逢九则抵销。秋分后二三级风主小雨，立冬后五六级风主小雪。以上四类规律指近期和短期预测。如系半年至一年的长期预测，则较复杂，需按总规律加以与四个大甲子套算。腊月三十晚的天象，是关键，可预断翌年的吉和凶。当晚有云又下雨，翌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晚通宵出现大星星，立夏将有百天大旱情。（编者按：旧时以干支纪时间，而以此判断天气晴雨，是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故本节（四）存疑，谨供参考）。

宝峰乡原属泸县玄滩区，后划归永川县来苏区。因此他在1970年以前，曾多次被邀请参加过泸县气象站、宜宾地区气象局、四川省气象台等的气象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参加四川省科学大会时，诗人代笔写过两份经验总结的书面材料，荣获多次表彰和奖励。他曾被泸县所属的玄滩、北碚、云锦、立石、奇峰、福集等区邀请去给中学生作气象知识的报告；还奉泸县气象站的指示在本乡亲手成立了宝峰气象点，按农事季节公布春播、双抢的天气预报，深受当地政府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在宝峰乡划归永川县后，也曾参加过一次江津地区召开的气象工作会议。自江津地区撤销划归重庆后，因路远人老，才中断了和政府气象机构的联系。